

新闻与传播评论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Review

秋 冬 卷

强月新◎主 编
夏倩芳◎执行主编

- ◎ 数字化时代的新闻与公共传播：李立峯教授访谈录
○ 李立峯 王海燕
- ◎ 反身性问题：基于一组人类学影像实践的讨论
○ 郭建斌 方 鑫 念鹏帆
- ◎ “我的诗篇”：中国语境下农民工话语权的一种另类实践
○ 吴 麟
- ◎ 国家信息合同：俄罗斯邦区媒体的公共服务与商业化生存
○ 【俄】奥尔加·德夫波什

新闻与传播评论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Review

①秋 ②冬 ③卷

强月新◎主编 夏倩芳◎执行主编



中国传媒大学 出版社

· 北京 ·

J
201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闻与传播评论. 2017. 秋冬卷 / 强月新主编.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8. 5

ISBN 978-7-5657-2213-4

I. ①新… II. ①强… III. ①新闻学—传播学—文集
IV. ①G21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 第 023899 号

新闻与传播评论 2017(秋冬卷)

XINWEN YU CHUANBO PINGLUN 2017(QIUDONG JUAN)

主 编 强月新

执行主编 夏倩芳

策划编辑 王雁来

责任编辑 王雁来

特约编辑 陈 默

责任印制 曹 辉

装帧设计 拓美设计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 1 号 邮编: 100024

电 话 86-10-65450528 65450532 传真: 65779405

网 址 <http://www.cuc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玺诚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7.75

字 数 282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57-2213-4/G · 2213 定 价 7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目 录

学术访谈

数字化时代的新闻与公共传播

——李立峯教授访谈录

李立峯 王海燕 / 2

特稿

反身性问题：基于一组人类学影像实践的讨论

——兼而反思田野作业

郭建斌 方 鑫 念鹏帆 / 24

研究论文

“我的诗篇”：中国语境下农民工话语权的一种另类实践

——“大工地诗歌节”之个案研究

吴 麟 / 48

港澳台地区公立美术馆的观众和观众发展

黄微子 / 69

算法新闻的伦理挑战

康斯坦丁·尼古拉斯·迪奥 凯瑟琳娜·霍毕希纳 / 87

网民公共性表达的法治优化问题

陈堂发 杨世宏 / 108

新媒体环境下政务微信采纳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广东区县级政府的实证考察

曾丽红 / 126

建构主义国际关系视域下洞朗对峙事件的话语折冲与博弈

——基于中印媒体舆论场的语料分析

江作苏 孙志鹏 / 151

专题:国际传媒业观察

国家信息合同:俄罗斯邦区媒体的公共服务与商业化生存

奥尔加·德夫波什 / 172

公共服务媒体的空心化

——BBC 内部生产商业化的建构制度主义分析

亚历桑德罗·达玛 / 194

内部监督者和外部观察站

——媒体监督的共同伦理目标

费尔南多·奥利维拉·保利诺 玛达莲娜·奥利维拉 亚罗·法利亚 / 215

前沿与综述

抗争范式:一个媒介与政治传播研究的切入视角

原永涛 / 238

书评

从传播到媒介:彼得斯与传播思想史研究的进路

刘海龙 / 266



学术访谈

数字化时代的新闻与公共传播

——李立峯教授访谈录

◎ 李立峯* 王海燕*

摘要:当代意义下的机构性新闻实践,是近两个世纪现代社会对公共传播这一问题所提供的答案。然而,伴随着互联网的崛起和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传播去中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机构性新闻实践的社会正当性遭遇越来越多的挑战。但作为公共传播的一部分,一个社会如何发掘、组织和传播与公众利益相关的资讯,是永恒存在的重要问题。新闻研究学界在当下环境下需要观察和思考的是,传统意义下的新闻正在发生什么变化,是否会以新的形式和构成出现,它在多大程度及在什么意义上仍然是或者不再是公共传播的中心。在此次学术访谈中,香港中文大学李立峯教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一一剖析,他的主要观点包括:(一)作为谈论新闻研究的起点,我们首先要对“新闻”这个词的两重不同意义进行区分,一个对应的是英文中的 news,一个是英文中的 journalism,两者关系紧密但不必然相关,有着相互重叠但又相互独立的一套理论和问题。(二)伴随着数字媒体的崛起,新的传播过程、

* 李立峯,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兴趣:政治传播、大众舆论学、社会运动和新闻学研究。

* 王海燕,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兴趣:新闻学、数字化媒体、职业群体、媒体与性别、传播政治经济学。

传播中介、制度基建,以及新的行动者都在形成,在这一空前活跃的图景中,机构新闻业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其作为公共传播中心的地位被撼动。(三)基于“大数据”的研究是大势所趋,但对“大数据热”需警惕,要认真考虑“数字方法”到底是什么,怎么用更加可取。(四)新闻教育不只是职业训练,新闻教育和新闻研究都不能完全回避价值理念的问题,但过分看重应该不应该的问题也不一定可取,学术研究还是要多做扎实的经验分析。

关键词:传播去中心化,机构性新闻实践,社会正当性,公共传播,制度基建,大数据,数字方法

Journalism and Public Communic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 An Academic Dialogue with Professor Francis Lee

Li Lifeng Wang Haiyan

Abstract: Journalism as practiced by professionals based in large media organizations is the solution offered by modern societies to the problem of public communication in the past two centuries. But with the rise of the Internet technology and advent of the digital age, communication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decentralized. This has necessarily brought about challenges to the legitimacy of organization-based journalism. However, how a society discovers, organizes and disseminates information relevant to public matters is the issue every society has to deal with. Therefore, journalism, as part of public communication, has long-lasting relevance. For the field of journalism studies, the urgent questions to ask in the current communication environment include: How has the journalism in traditional sense changed? Whether new kinds of journalism have appeared and in what forms? How has the institutional infrastructure of journalism and public communication been reconfigured accordingly? Whether and to what extent journalism is still at the center of public communication?

These are the issues we explored in this academic dialogue with Professor

Francis Lee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is main arguments include: (1) As a starting point to talk about journalism studies in the current environment, we need to recognize that the Chinese term “xinwen” has two different meanings in English, i. e. news and journalism, which are interrelated but separate concepts pointing to different theoretical questions. (2) The rise of digital media has brought about new communication process, new institutional infrastructure, new communication intermediaries, and new actors, and for organizational journalism the biggest challenge is the undermining of its central role in public communication. (3) Researches based on “big data” will undoubtedly grow, but we need to be cautious about the “fever of big data”, and devote more energy into exploring what digital methods can and cannot do. (4) Journalism education is not merely occupational training, and both journalism education and research cannot avoid talking about norms and values. Nevertheless, there should not be an overemphasis on normative questions; more empirically grounded studies are still what journalism research needs primarily.

Keywords: decentralization of communication, organizational journalism, legitimacy, public communication, institutional infrastructure, big data, digital methods

题记

进入 21 世纪以来,新媒体技术迅速发展,数字化时代加速到来,从方方面面改变着社会的形态,也改变着新闻传播的制度格局和社会实践。面对当今社会越来越明显的传播去中心化趋势,建立在主导 20 世纪的“大众媒体”和“大众传播”理论根基上的新闻研究学界也有着诸多反思。在新媒体的背景下,新闻学研究面临着哪些挑战,又有哪些机遇?有哪些新的议题、新的现象值得关注?它们如何挑战着我们固有的理论和方法认知?创新和拓展的空间何在?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访谈了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李立峯教授。李立峯教授研究兴趣广泛,涉猎政治传播、大众舆论学、社会运动研究和新闻学研究等多个领域,自 2003 年从斯坦福大学博士毕业到香港任教短短十几年时间,已经发表论文 150 多篇、英文学术专著 4 本,

另主编论文集4本。他目前是两本SSCI期刊*Mass Communication & Society*和*The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的副编辑(associate editor)。自2017年8月开始,李立峯教授任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

一、数字化时代的新闻:公共传播与文化实践

王海燕(以下简称“王”):《新闻与传播评论》的编辑最初的想法是希望我们大致谈谈新闻研究的问题,但在我们为这个访谈做准备的沟通过程中,我留意到您做了小小的修正,您说我们来谈谈新闻与公共传播(Journalism studies and public communication),那么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是,您认为“新闻”(journalism)应该如何定义?它与公共传播的关系是什么?

李立峯(以下简称“李”):在你的提问里,你把新闻等同于英语中的journalism,我反而想先往后退一步,从中文词语“新闻”的两重不同意义讲起。有趣的是,在英语中,journalism和news是两个不同的字眼,中文却只用“新闻”一词来代表两者。我觉得,把journalism和news分开,有些问题比较容易说得清楚。简单地说,news指的是一些受众之前未曾听闻的新资讯。广义地看,news不只是新闻机构提供的东西,它是在我们日常生活里不停出现的东西,社会学者甘斯(Herbert Gans)几年前写过一篇反思什么是news的文章,就很强调这一点。例如很多人每天下班回家后会跟家人分享当天发生的事情,那些被分享的讯息和故事,也是news。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在日常生活里出现的“新闻”,其实跟新闻机构提供的新闻已经有不少共通的地方,例如在日常生活里,我们会根据谈话对象是谁而决定跟对方分享什么资讯,我们也会判断哪一些资讯值得分享,也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领域中分享的“新闻”,也会有“新闻价值”和受众兴趣的考虑。

当然,日常生活中的新闻通常只是一些属于私人领域的讯息,大概只有自己身边的人会有兴趣知道或者会受到影响。但社会上也存在着很多具“公共性”的讯息。所谓具公共性,回到杜威(John Dewey)的说法,不外乎是指讯息及其指向的事情,对社群中所有人都有一定的影响,关乎一个群体的利益。于是,任何社会或社群,都需要处理一个根本问题,就是跟公众相关的、具公共性的资讯如何能有效地被发掘、组织和传播,让社会里的人都可

以得知相关资讯,以及可以根据资讯决定个人的行为以至对公共议题进行讨论。这就是公共传播(public communication)的问题。

顺着以上的思路,我们可以说,当代意义下的 journalism,是近两个世纪现代社会对公共传播这一问题所提供的答案。Journalism 指的是一种制度化的社会实践和通过这种社会实践而产生的、具备某些特定形式的“文本”。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社会实践由在资源丰厚的机构内工作的、专职的受薪人士来负责。同时,这批专职人士又发展出一套价值和理念,指导和规范自己的工作,确立自己工作的正当性(legitimacy),以及防范外界对其工作的不合理干扰,传播新闻的工作也因此成为一种专业。那些机构组合起来,就成为社会上的新闻媒体系统,其整体上的功能,就是向大众发送大家需要知道的和应该知道的讯息,监察社会,促进讨论。

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变迁,近年学界的确有不少“如何重新定义新闻”的讨论,我甚至听过一些国内的学者朋友说,journalism 好像变得没有那么重要或值得研究了。但若根据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说,公共传播的问题,即一个社会如何发掘、组织和传播跟公众利益相关的资讯,是永恒存在的重要问题。我们需要观察和思考的,是传统意义下的 journalism 正在出现什么变化,它是否会以新的形式和构成出现,以及它在多大程度及在什么意义上仍然是(或者不再是)公共传播的中心等问题。例如几年前美国出版的一本名为《最后一位记者请关灯》(*Will the Last Reporter Please Turn off the Lights*)的论文集,讨论美国新闻业在数字转型下的“危机”,文集中很多文章都可以粗略地分为两派,一边认为如果新闻机构难以继续生存,会对公共传播构成很大的伤害;另一边却认为互联网带来的是新的公共传播模式和形态,新闻机构的功能会被新的实践和现象取代,所以人们无须执着于新闻机构的未来。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学者关心的是公共传播,那么传统意义下的 journalism 是否仍然那么重要,的确是一个可以反思的问题。

王:您在区分“新闻”这个词的两个英文表达 news 和 journalism 时,特别提到公共性(publicity)的概念,就像您所说的,news 从广义上来理解,其实就是新鲜资讯,它是 new 的复数形式,它可以是关于公领域的资讯,也可以是关于私领域的资讯;可以是专业人士与普通公众之间的沟通,也可以是普通公众与普通公众之间的沟通。在前一种沟通背景下,news 通过 journalism 传

播,具有机构性的色彩;而在后一种沟通背景下,news 并不一定通过 journalism 传播,或者至少不需要机构性的 journalism 来传播。但其实现在,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非机构性的 journalism 实践,也看到越来越多的在公共空间传播关于私领域话题的 news。这可能是在现时环境下研究者们谈论起“新闻”来常有概念不清的困惑的原因,不仅是因为在中文语境中难以对“新闻”的 news 和 journalism 两个层面的内涵进行区分,而且也因为不管是 news 还是 journalism,其形式越来越多样,新型实践层出不穷,如果我们对“新闻”的理解过于狭义的话,的确容易陷入困境。不知您认为有哪些角度能够让我们在当今情况下更加有效地谈论“新闻”的复杂性。

李:从公共传播的角度来看,如果我的理解没有错误的话,有很多其他现象在中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比如,政务微博的传播功能和影响可能比传统新闻媒体更大。这里当然有场景的因素,因为内地的新闻界在制度上从属于国家,在新闻工作者的观念中,相比于西方社会,也不会太强调公开的监督和批判功能。德国学者托马斯·汉尼驰(Thomas Hanitzsch)在66个国家和地区对新闻工作者进行了抽样调查,其中一个研究结果就是若将新闻工作者的理念放到一个“跟政府合作—监督政府”的维度上,中国的新闻工作者的态度是66个国家和地区中最强调合作的几个之一。不过,不管在规范意义上我们喜欢合作多一点还是监督多一点,我觉得当新闻媒体少强调监督的话,媒体在报道跟政府和政策相关的资讯时,就很难做到有很大的附加价值,因为在新的传播环境中,人们为什么不直接看官方渠道发布的资讯呢?这也指向我提及的去中心化问题,但去中心化的程度和形式在不同政治社会环境下并不一样。

回到你问题的重心。的确,新科技带来新的可能性,也因此带来新的实践,很多时候,这些新的实践会冲击我们对新闻的理解。例如1992年,伊莱休·卡茨(Elihu Katz)在《传播学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讲述他观看关于1991年海湾战争的电视新闻报道时的感受和观察结果。文章题为《新闻的终结》(*The End of Journalism*)。卡茨的批评对象是CNN当年的现场直播式的报道,卡茨认为那些现场直播根本不算新闻(journalism),因为新闻(journalism)一定涉及编辑工作(editing)——不是指狭义的新闻机构内部分工中的编辑工作,而是概念上的资讯筛选、整理和诠释的

工作,新闻不只是报道事实和资讯,还要向受众提供对事件和议题较完整的“故事”,让受众能够理解这些事件和议题。相比起直播科技,互联网带来的可能性更多样化,而且互联网使所有人都可以参与内容生产和传送,自然能产生更大的冲击。例如公民新闻(citizen journalism)出现后,我们也可以问,是不是路人用手机拍下一次意外事件的一些影像,然后放到网上,就等于做了记者的工作?这种讨论也是在问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什么才“称得上”是新闻。

要留意,既然我们说新闻的定义在演变之中,那么新闻应如何定义,可不是学者们说了算的。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有利于分析新闻如何演变的思路。这里,我们也许可以参考文化研究大师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对“文化”一词的分析。他指出“文化”可指向三种东西:文明、生活方式和文化产物。我想指出的是,威廉斯认为我们无须把文化简化为三种意思之一,也无须尝试把三种意思归纳为一个完整的定义。我们要做的是通过了解这三种意思之间的异同,以及它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来分析各种跟文化相关的现象和问题。

如果我们用同样的思路去考虑新闻的话,就是要理解新闻既指向 news,亦指向 journalism。就 journalism 来说,现实中,新闻机构提供的产品就是 journalism,但在规范意义上,有某些特征的才算得上是 journalism。而随着科技发展,普通人也有可能生产出在规范意义上“合格”的 journalism。我们没有必要——坦白说亦没有办法——消除新闻一词的多义性,但如果我们对这些不同的意义和它们之间的关系能有较敏锐的触觉的话,我们就能够更好地了解新闻正在如何演变。

王:从公共传播的角度来看新闻(journalism)的话,它只是公共传播的一种形式,虽然在实践形式、规范、伦理上与政治宣传、公共关系等有所不同,但归根到底都是关于公共事务的传播。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公共传播也可以说只是新闻(journalism)的一种形式,因为新闻不仅可以关涉公共传播,也可以关涉非公共传播,比如明星八卦等娱乐新闻,或者现在比较新鲜的以非公共传播的形式进行的公共传播,比如穿着睡衣或者内衣的网络主播用不太标准的语音向她的“粉丝”播报着时事新闻。请问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种非公共传播形式的新闻?

李:你的这个问题中包含了两个其实颇不一样的议题。让我先谈你所指

的“以非公共传播的形式进行的公共传播”。要留意,这也不是什么新现象。20世纪90年代开始,西方的新闻学和政治传播学者就有很多关于资讯娱乐化的讨论。所谓资讯娱乐化,其所指向的现象包括一些时事资讯和讨论越来越多地在娱乐节目里出现,也包括原来严肃专业的新闻内容的娱乐化,这个现象在报业出现后,也常被称为小报化。我不在这里系统地回顾那些文献和讨论了,就谈谈你举的例子。我没有看过那些睡衣或内衣主播如何报新闻,但面对这一现象,我想有几个问题是很重要的。第一,她们播报的内容是什么样和什么题材的新闻?这些新闻内容本身是否具备公共性?第二,更重要的是粉丝在看她们的直播时,用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接收模式(mode of consumption)。这里所指的接收模式,是法兰克福学派强调的东西。同样一件艺术品,可以是人们细心欣赏和冥想的对象,也可以是游客们纯粹慕名而至,拍张照片,证明自己曾到此一游的对象。所以,就算报道的是严肃的新闻内容,也要考虑受众是否会认真地去了解和思考内容。这也是为什么专业新闻工作者对娱乐化的表达形式会很抗拒,因为报道形式可以影响接收模式。

不过,我们也要留意,资讯娱乐化的影响,也不一定完全是负面的。我们也要问,那些网络主播能否接触到一些平时不看新闻的人?另外,平时看严谨的新闻报道的人会不会转向只看那些网络主播?换句话说,他们对新闻资讯在社会上的传播面和接触面有什么影响?资讯娱乐化的其中一个可能的正面影响,是令新闻资讯传播面更广,以及收窄不同教育程度及社会阶层的市民之间对新闻的认识的鸿沟。无论如何,从直觉上,我固然不觉得这种现象很健康,但它的实际影响是什么要通过经验研究才能说清楚。

至于你的提问涉及的另一个议题,是跟公共传播并不直接相关的新闻。的确,很多新闻机构生产的内容并不涉及狭义的公共事务,这也是为什么新闻学和政治传播学只是部分重叠的学科。新闻学研究中,也有学者从其他出发点来分析新闻。例如一些文化研究学者可以把新闻看成一种普及文化,如果从这个视角出发,那么体育娱乐八卦等都会是很重要的研究题材。

我从较个人的角度来谈谈这点吧。我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想法,就是开设一门名为“新闻与普及文化”的课程。这课程可分三部分,分别为关于普及文化的新闻、作为普及文化的新闻,以及普及文化里的新闻。用英文表述,就是 journalism of popular culture, journalism as popular culture 和 journalism

in popular culture。每一部分,都有一些有趣和重要的议题。例如关于普及文化的新闻,娱乐新闻向来都是普及文化的互涉文本(intertextuality)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也可以与普及文化工业的发展和运作有密切的关系,其实我一直不明白研究普及文化的人为什么不多研究娱乐新闻;又例如普及文化中的新闻,即关于调查新闻的美国电影《聚光灯》(*Spotlight*)、《总统班底》(*All the President's Men*)或电视剧《新闻编辑部》(*Newsroom*)等文本如何呈现记者、新闻机构和新闻工作,它们可以建构公众对新闻工作的认知,也可能影响到公众对新闻机构和记者的态度和信任。至于作为普及文化的新闻,则有较多研究,重点通常是文化观念、常识,或叙事框架如何在日常的社会新闻中反复出现,正如杰克·鲁尔(Jack Lule)的经典著作《日常的新闻说的是永恒的故事》(*Daily News, Eternal Stories*)。我们其实可以通过分析新闻来了解文化,换个视角,就能提出不一样的问题。

二、数字化时代的新闻研究:去中心化与制度重建

王: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传播环境发生很大的变化,过去我们不需要特别说明,说到“传播”,自然指的是“大众传播”,说到“媒体”,自然指的是“大众媒体”,这是20世纪的主流故事。但是现在,传播越来越去中心化,大众分散为各种不同的群体或者“小众”,媒体的形态也是百花齐放。在你看来,这种传播环境的变化对新闻研究意味着什么?

李:传播环境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数字科技与之前很多新传播科技不一样。例如电视的出现使新闻的传播多了一种形式,多了一些渠道,以及媒体系统可能多了一些机构,但它没有改变“大众”传播的基本格局。数字媒体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们往往只是平台的提供者而不是内容的提供者,在数字平台上提供内容的,有传统的新闻机构、有新兴的传播行动者、有千千万万的大众。不过,数字平台虽然不一定提供自己的内容,却可以主宰内容提供者能接触到多少受众,也有能力抢走内容提供者的收入。它一方面对传统新闻机构的营运模式造成很大的冲击,另一方面又促进了新闻传播行动者和新传播机制的出现。

如此复杂多样的变化,不容易在简短的访谈中系统地论述,但对于新闻

学研究和教育,以至于传播学整体而言,有两点我是较为重视的。第一,在大众传播时代,主流的传播学研究大都离不开“生产—内容—接收”这三个部分。无论是英国文化研究讲的编码/解码模型,抑或是媒介效应、新闻生产等研究范畴,都指向那三部分、三部分之一或二。在内容和接收之间出现的发布过程(distribution process),是很少有人研究的,例如报章贩售方式和网络,我不敢说没有人研究过,但肯定为数不多,亦没有进入新闻研究的主流视野。同样,对于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如何扣连在一起,新闻讯息如何通过人际网络流通,早期的芝加哥社会学派学者,如 Robert Park 等,固然有一定的论述,伊莱休·卡茨和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的二阶传播理论也是重要的文献,但自 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相关的理论发展和经验研究也不多。

不过,在数字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年代,对新闻发布和传送过程的分析变得越来越重要。相关的研究可以很多形式出现,简单一点的,一些研究者会分析什么因素或内容特征会使新闻内容在网络和社交媒体上更多被分享,分享价值(shareworthiness)和传统的新闻价值(newsworthiness)之间有多大差异。另外,意见领袖(opinion leadership)这个概念,在近几年的传播研究中又“热”起来。这是因为大家明白,在网络上,人们往往不是直接从新闻机构那里获得新闻内容,而是通过朋友的分享而看到新闻。

一些学者也开始尝试为新闻在网络上的发布和传送做一些较为系统化的理论建构。Esther Thorson 和 Elizabeth Wells 于 2016 年在学术期刊《传播理论》上发表了一篇讲述“策展流”(curated flow)的文章,这是一个不错的例子。两位作者指出,新闻内容在数字和社交媒体上的流通越来越取决于各种策展者(curator)如何选择内容。他们把社交媒体上出现的策展者分为五类,分别为新闻界策展者、代表商业机构或政治团体的策略策展者、个人策展者、代表各种社会组织和力量的社会策展者,以及社交媒体平台本身的演算策展者。这些策展者的运作逻辑和理念并不一致,而他们的运作及互动,形成了各种复杂多变的资讯流通路径。

我在最近的一篇学术文章中也尝试分析新闻资讯在网络上的流通及其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新闻事件本身的转化,但我强调的不只是“策展流”,而是网络上的行动者在传播新闻资讯时,往往会对新闻资讯加以诠释和评论,甚至为新闻事件创造新的框架、重新定义事件的中心议题,或引导议程发展的方向。所

以,新闻在网络的传播不只是一个资讯流通的过程,也可以是一个新闻事件转化和发酵的过程。以政治资讯循环(political information cycle)为主要概念,通过对资讯循环中的动态过程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传统新闻机构和网络上的新行动者之间如何互动,以及传统新闻机构在网络时代的力量和限制。

除了发布过程的重要性外,研究者需要多思考和关注的另一个重点是制度重建的问题(institutional reconfiguration)。我所说的制度重建,是指传播在制度层次上的基础建设出现了什么变化,使传播渠道和过程出现什么新的可能性和机会。正如中国发展高铁,交通基建出现了重要变化,人们在城市之间移动的方式也会因新的可能性和机会而变化,要了解人的流动,首先要搞清楚交通基建系统。传播也是一样的,要了解新闻和资讯的传播,首先要搞清楚资讯传播的系统 and 制度基础。

这点其实在上面的讨论中已显现出来。在大众传播的时代,数量有限的新闻机构掌握着接触大众的钥匙。专业新闻工作者就是公共资讯的把关人,用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说法,他们掌控着公共性的氧气(the oxygen of publicity)。换句话说,大众传播时代的公共传播的基本形态,就是所有社会和政治行动者都要通过主流媒体来跟“大众”沟通。

当然,就算是大众传播时代,另类媒体和小众媒体都是存在的,但它们的力量和影响非常有限。而互联网和社交平台的出现,降低了媒体内容的复制和传送成本,助长了另类媒体和小众媒体的发展。政府、商业机构以及社会组织等亦可以通过网络直接接触目标受众。同时,互联网的发展使得很多新的行动者和数字中介(digital intermediary)出现,网络上资讯爆炸,参与受众注意力竞争的单位也是前所未有的多,大众分裂成众多的小众,主流新闻媒体在公共传播中的中心位置不可避免地受到挑战。

在这个背景下,研究者需要关注的是公共传播的制度基建(institutional infrastructure)发生了什么变化。当然,这里的困难,是公共传播的制度变迁仍然在急速进行之中。以香港为例,过去几年,有很多以策展新闻为主的网媒出现,这些网媒资源不多,没有多少第一手的新闻报道,它们往往是把传统新闻媒体的东西经筛选、拼凑和重新包装后推送出去。同时,传统新闻的营运面临很大的挑战,但若传统媒体生存不了,那些以策展新闻为主的网媒,也会失去内容来源。传统媒体和以策展为主的网媒究竟会以什么样的